

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因应

——以抗战中期民盟组建为考察中心(1939—1941)

黄 天 华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6)

摘要: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分化、组合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充满了曲折、变化,并非如既存研究所说的那样简单整齐。抗战前期,中间势力与国、共两党都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甚至有斗争。抗战中期,中间势力为了协调国共冲突,增加自身份量,开始联合起来,先是建立较为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继而建立较紧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作为统建会成员的第三党和救国会对此新组织都一度有所疏离。对于中间势力的联合,国民党是不信任、不支持的,并尽力予以阻止和打压,逐渐将其推而远之;中共则由怀疑到鼓励、支持与帮助,逐渐拉而近之。虽然,中间势力内部也有各种矛盾,各自的立场和选择不尽一致,但整体来说中间势力是由最初偏向国民党转为逐渐倾向中共的,这无疑是抗战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变化,对后来中国的政局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间势力;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国民党;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129-11

1995年3月,胡绳就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作谈话时说:“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乔木同志一次谈过去的文学时曾说,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1]3}如今,近二十年过去了,胡绳所说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仍然集中在国、共两党,对于“占大多数”、“作用很重要”的中间势力却关注甚少,了解甚少。

胡绳又说:“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在实际生活中,中间势力也在不断分化,这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抗战时期这种分化最明显。中共把抗日的旗帜拿在手里,举得最高,吸引了许多人,加速了中间派的分化。”^{[1]3-4,36}也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间势力变化最大的时期,是国共政治力量对比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但是,目前关于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分化、组合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的论述多有倒放电影的倾向,多用1947年以后的历史来倒推此前的历史,因此很多史实被遮蔽、误解甚至扭曲了。

本文主要利用新近开放的《蒋介石日记》、《黄炎培日记》以及此前很少被人利用的青年党、国社党资料,重新梳理中间势力的分合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

收稿日期:2013-01-09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川康实力派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2011M500041)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黄天华(1977—),男,四川盐亭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川康地方史。

系,主要想厘清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①。一、1937—1941年间青年党、国社党与国民党、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要和其他党派合组民盟?各自又在民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二、民盟首任主席黄炎培在民盟即将公开前夕却要求盟友为其守秘密、“否认其参加组织”,且对人评说梁漱溟“主观深”、梁主办的《光明报》很快就要“黑暗”了,梁漱溟则在多年后斥责黄炎培“老猾无耻”,那么梁、黄二人的分歧何在?他们又在民盟成立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三、一般多说民盟成立时是“三党三派”^②,可是中共的资料表明第三党并不是民盟筹备成立时的核心成员、仅仅是被邀请加入的,而救国会根本没有被邀请加入刚刚成立的民盟、只是在1942年才正式加入,这又是为什么?四、民盟在香港筹备公开的时候,桂系代表甘介侯和东北同乡会的周鲸文已经参与其中,桂系的参与说明民盟与地方实力派从一开始就在互相借重,而周鲸文等人则“因要求释放及起用张学良未能实现,对政府反感甚大,态度亦甚左倾”^{[2]43}。总之,早期民盟的组织比既存的认知更复杂,其历史也充满了曲折、变化,非常值得深入探讨。

一 青年党、国社党与民盟

在民盟成立以前,中间势力中最重要的党派就是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这两个党与国、共之间都各有争斗与合作史。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后,青年党“便立于其反对地位。因此,当北伐前后,国民党势力进达各省地方,曾演过惨烈斗争,几乎被消灭”。直到1930年代中期,国、青两党才逐步走向合作。国社党虽然成立于1934年,却是“中国政治上最老党派之余留。那就是梁任公一派系。从清代的变法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以至民国以来的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一派传下来”,其历史甚至比国民党还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青年党、国家社会党迅即表示要拥护国民政府、要与国民党共患难,国民党则容许其他政党之合法存在。1937年7月,国社党领袖张君劢参加庐山谈话会,这是他“自民十五后,第一次与国民党要人见面”^[3],也就是说此前两党的关系并不好。1937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参议会,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和青年党领袖曾琦、李璜、左舜生都是与会人员。1938年4月13日和21日,张君劢和左舜生先后代表国社党和青年党致书国民党正副总裁蒋介石、汪精卫,表示拥护国民政

府,要与国民党共患难,蒋、汪也分别回函表示钦佩与感慰。这几封信发表后,引起了各方的注意。4月27日,《大公报》发表社论称:“经此往来信之发表,可谓该两党已取得公开存在之地位,而同时加强国民党领导全国的立场”,所以,此举“于增进政治的团结上,当然有重大的意义”^[4]。张君劢也说:“这个交换信件的意思,解决两个问题:(一)政府承认国际社会主义的内容与三民主义不相违背,(二)政府在事实上容许其他政党之存在。”^{[3]59-62}

稍后,国社党与中共发生了政治交锋。1938年12月10日,张君劢发表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呼吁中共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取消特区之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以期“达于真正之团结”^{[5]83-85}。1939年1月15日,陈绍禹(王明)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上发表演讲,指责张君劢“与汪精卫关系太密切了”,张的公开信“不外是反共、反八路军、反陕甘宁边区,与汪精卫以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电中一原文注)所讲的反共内容没有两样”^[6]。随后,张君劢发文反驳陈绍禹的说法,称:“同一国中两种军队两个政府并存,异日对日抗战虽完,而内部问题又生,甚且激而生变,则国家统一将何日可能实现乎?”^[7]其实,双方都想达至团结,只是对于达至团结的途径认识不同,因而产生了分歧。无论如何,两党之间闹了不愉快。

只不过,国社党、青年党与中共很快在民主宪政方面展开了合作。1939年4月21日,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秦邦宪、李璜、黄炎培等人聚餐,“商合作问题”^{[8]第六卷,108}。9月,在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陈绍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都提出类似的提案,要求“政府结束党治,施行宪政”,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达成如下决议:“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8]第六卷,179}。随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议于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宪政期成会也由黄炎培、张君劢等人组成。接着,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宪政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人们对尽快实施宪政有着很高的期待。

青年党这时的策略则是“对国民党明合暗反,对共产党暗合明反”,因为青年党有其自身的政治考量。1939年12月2日,李璜就说:“现在应努力宪

政运动,促进民生,拉拢民众,竞争选举”,“抗战假使失败,则使各省将领割据独立,是时战不能战,乱不能平,当然出之议和一途,届时吾辈即出而联络各方,与苏、日继续作战,扫除汉奸政府,实行联省自治,重组中枢,以全民政治相号召,各党各派及民众,当然拥戴吾党出而主政,此即不流血革命,吾人宜努力之”^{[9]199-200}。12月24日,重庆青年党又举行党派问题座谈会,得出结论:“甲、国民党组织不健全,内部派别分歧,必至瓦解;乙、三民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丙、国共冲突及苏联野心应密切注意。”^⑧1940年2月初,李璜和张君勱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深以国民党压迫彼等所领导之青年党、国社党为憾”^{[10]第二册,222}。也就是说,青年党和国社党都对国民党有所不满。

同时,青年党对共产党也竭力予以防制,甚至愿意在必要时帮助国民党铲除共产党。1940年2月,国民党得到情报:“青年党因川省为该党历来根基最厚之地,现鉴于共党在省内积极活动,恐碍其开展,乃筹划防共,除积极加强组织,整理该党党务以外,并决定防范共党活动之办法如下:(一)翻印《铲共须知》与《共产主义批判》、《唯物史观批判》等书,散发各同志与各界民众,使发生同仇敌忾之心理。……(四)令该党同志多读反共书籍。(五)加强该党组织,并令各县从速整理党务,训练同志,护党反共,必要时再帮助政府铲共。”^{[9]202-203}种种迹象表明:青年党仍然有其“革命”情怀,仍然对国、共两党都反对,只是在抗战的局面下,其策略与方式有所调整而已,时而联甲打乙,时而联乙打甲。

1939年11月23日,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等人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详后)。次年3月20日至30日,张君勱、黄炎培等人主持的宪政期成会草拟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主张在国民大会休会期间,设置国民大会议政会以监督政府。但此议在随后召开的参政会上遭到国民党党员的反对,蒋介石也于开会时,“对于宪草中牵制政府权力之规定,表示不满;语侵罗隆基等。国社党及青年党诸参政员颇懊丧”^{[10]第二册,252-253}。最后,期成会的修正案并未付诸表决,蒋仅表示和“五五宪草”一起送政府参考。这就引起了张君勱等人的强烈不满。张氏随即在《东方杂志》刊文说,虽然“吾人平日主张目前在野党不应在战时有夺取政权的行为,但是政府不应该始终关门闭户,不让党外人参预国家大

政”^{[3]59-62}。可是,蒋介石仍然于当年9月正式决定延期召集国民大会。

同年12月24日,国民党公布第二届参政员名单,不仅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和救国会的张申府等敢言之士被除名了,共产党、青年党及国社党都没有添加新人,而且国民党员大大增加,占了半数以上议席,如此一来,“在野党之任何议案,皆不易于通过,除随声附和,只有缄口结舌,随众进退而已。于是最初之民主气象,又为之顿减矣”^{[11]245-246}。李璜说,章伯钧被除名,“这明明是当局大有杀鸡儆猴之意。因是令在野党派而有独立主张,不肯唯唯诺诺于参政会中者,皆从此内不自安,而思有以自固其壁垒了”^{[12]568}!果然,章伯钧随即和青年党之间颇有合作。

1941年1月2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江南惨变(即皖南事变—引者注)发生后,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为[必]要。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以及国民党左派。开始时,或无公开之中共人士参加,但愿与我们保持合作,……二、章伯钧拟请中共,国社党,救国会,青年党,第三党各出一人,加上梁漱溟、黄任之,成立一秘密核心,以领导上述民主联合会工作。三、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苏、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党建立更密切之合作。”^{[13]54-55}此电透露几个重要信息:一、第三党与青年党正积极筹议成立“民主联合会”;二、章伯钧拟邀请中共作为“民主联合会”秘密领导核心的成员;三、第三党因为当局之压迫而日渐左倾。按:此处“日渐”二字说明此前第三党并不怎么倾向中共,只是因国民党把它推开甚至抛弃了、中共却对第三党的合作要求“极端赞同”,故第三党有日渐左倾、与中共合作的趋向。

与此同时,青年党又在和国社党、职教社、乡建派等党派商讨成立新组织事宜。1940年12月24日,即第二届参政员名单公布当天,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勱四人相会于张君勱家,“彼此感慨同深”,遂“商新组织问题”,黄炎培提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8]第七卷,46}。接下来几天,梁、黄、左、张等人又继续有所商谈。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中间势力在调解国共冲突过程中,感到国共立场差异太大,第三者必须联合起来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新组织的筹组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共识。3月12日,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李璜、罗隆基、张澜、梁漱溟等人继续会商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事宜,并推黄炎培为民盟主席。次日,民盟政纲12条议决。3月1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及救国会加入。”^{[14]509}这说明在民盟筹组过程中,和中共较接近的第三党及救国会都不是核心成员,而是被邀请加入的。这一点在黄炎培3月12日、13日日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即救国会和第三党的领导人没有参加民盟的筹组。而且,结果是当时只有第三党被邀请加入了,救国会并没有被邀请加入。同时,这也表明青年党对中间势力的联合颇为积极,和各方都展开了接洽,只是它一度抛弃了第三党。

3月19日,民盟正式成立,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被选为常委,左舜生被选为秘书长。不过,青年党和国社党随即在盟务上产生了分歧。梁漱溟回忆说,本来民盟内定赴香港主办机关报的是罗隆基,张君勱亦答应赴港协助,结果这两位国社党的负责人都没去。7月初,黄炎培、张君勱、罗隆基等人又在昆明商定:“对于原来纲领十二条,保留四条,先发表八条”,“对于将次开会之参政会,除海外同人可不出席外,在内地者均出席”,“对外间为黄公及江问渔君守秘密,否认其参加组织”;而黄炎培等人决定不公开发表的政纲条文都是“揭出吾人衷心要求之条文(如反对国库负担党费,反对特务机关等)”,其同意公开发表的条文“字亦有删改(如第二条删去‘结束党治’四字)”;黄、张诸人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力避刺激国民党”,不想和国民党闹翻^④。

9月18日,梁漱溟主持的《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10月10日,《光明报》以广告形式刊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启事》,公布了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纲领。就在民盟正式公开前夕,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并和梁漱溟一起提议由张君勱继任主席,但遭到了青年党的反对。梁漱溟说,这是因为“青年党之左(舜生)自以为党势大过张之民社党,不肯以主席地位让于张”^{[15]第六册,363}。12月1日,在青年党的力推下,张澜被选为主席。对此,国社党的罗隆基颇有些不满。他说:“民盟主席张澜是个四川人,他经常住在成都。青年党另一个领袖李璜是民盟的一个中央

常委。他在成都主持青年党的党务,同时他就设法就近影响张澜主席,而在盟务上李就成了张澜主席的参谋人和盟务的实际执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青年党实际上操纵把持盟务是必然的结果。”^{[16]203}由此可见,青年党与国社党在民盟中互争雄长。

同年11月16日,民盟又在重庆正式公开。紧接着第二届第二次参政会举行,张君勱、左舜生、张澜等人在会上提出议案,要求: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正式民意机关;不以国库供党费;军队中停止党团组织。王世杰观察到:“蒋先生阅张君勱等提案甚愤慨,并疑张君勱与德国及敌伪有勾结。”^{[10]第三册,190}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说:“张澜、张君勱等提出取消党治案十条,是诚反动之尤者,此种卑污政客比汉奸更为可怜可恶也。”^⑤参政会后,蒋就把张君勱软禁了。可以说,民盟公开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国社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1942年初,蒋介石一度打算分化民盟,首先拉拢的就是青年党,试图予以处置的则是国社党。1月14日,蒋邀左舜生谈话,“劝青年党勿与国社党、共产党共组团体”^{[10]第三册,231}。大约同时,昆明等地因“飞机运洋狗事件”^⑥而引起大规模的学潮,蒋密令康泽赴昆明调查,看是否是国社党在幕后操纵,结果与国社党无关,蒋竟“怒不可遏”^{[17]252-253}。可见,蒋对国社党已憎恨至极。

二 梁漱溟、黄炎培与民盟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曾一度有意拉拢梁漱溟。1938年,国民党同意梁漱溟访问延安,1939年又赞助其视察华北游击区域。但当梁漱溟于1938年12月提出综合各党成立大国民党计划时,国民党并不接受他的方案,也没让他公开发表。1939年10月,梁漱溟在华北“目睹党派交恶、短兵相接之实况”后返回成都、重庆,深感大后方如火如荼的宪政运动在当时实属文不对题,最急最要者应为团结统一,而要达成团结统一,必先解决党派问题。他曾与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等人座谈,提出“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陈绍禹表示“军队属于国家是可以的,只要国民党实行,我们就照办”。随后梁漱溟拜访张群,张群则说:“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真是书呆子!”张群的一席话对梁简直是“如同冷水浇背”^{[15]第六册,960-961}。与此同时,中共对梁漱溟的印象

也不佳,认为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派“是靠近于大地主阶级的中间派”,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晏阳初的平教会等教育团体相比是“最右的一派”^{[18]537}。而梁漱溟在成都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河北摩擦事件是共党的责任,代摩擦分子做留声机”;中共川康特委因此特意“找朋友去与他谈话与解释”,同时又通知阆中等地的同志,在乡村教育系分子“作恶意宣传时作斗争,使他们在社会上失了信用”^{[19]343}。

很可能因为感觉到两边都不讨好,梁就产生了“先谋第三者之联合”的想法。10月初,梁漱溟与黄炎培、李璜、晏阳初等人多次在成都“深谈”;10月13日,梁漱溟进一步向黄炎培等人提出“统一党派之必要与可能”^{[8]第六卷,188—190}。梁漱溟回到重庆后,又积极与救国会、第三党的领袖接洽。虽然各方的政治观点不同,目的也不尽同,但很快就达成了联合起来的共识。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黄炎培似乎对成立统建会仍然有所保留,并不是发起人,仅仅是参加而已。他这天的日记说:“梁漱溟、沈衡山、左舜生、章伯钧等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余参加之。余担任接洽高君、吴贻芳、冷遹、江恒源、王志莘。”^⑦稍后,统建会商定由黄炎培和梁漱溟作为代表晋谒蒋介石,面陈一切,结果到时只有梁漱溟一人前往,而黄炎培却借故离渝。

1940年3月,对于即将召开的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统建会本来“商量作共提案,将当前大问题,分作一二三几个,由同人分别担任起草提案”,由梁漱溟担任其中关于党派问题的提案;但当梁提出草案后,“大家讨论,在措词上,在办法上,意见互有出入,不能归一”,遂改由梁漱溟个人提出;梁漱溟的提案,在“觅同人联署时,许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签名。只有几个熟人”,如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张申府、张澜等签名;而且,黄炎培虽然签了名,但是劝梁“不要贸然提出,应先请示议长蒋公,至少亦应先向王(世杰)秘书长说明之”;梁漱溟并未如此做,而是直接提交到4月上旬举行的参政会^{[15]第六册,255—259}。这充分说明统建会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对其成员并没有约束力,梁、黄二人意见也不一致。

梁漱溟在提案中建议:“指定参政员数人组织委员会,商讨山西河北等处共产党军队与其他军队冲突事件。”蒋介石“在大体上赞同之”,但表示:“此为

军令军纪问题而非党派问题,军令军纪是不能有讨论余地的,然而参政同人若愿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后则政府自有权衡。”其后,国民参政会为此成立特种委员会,却不让梁漱溟参加^{[15]第六册,962}。可见,国民党对梁漱溟不满。

其时,黄炎培对国内政局也感到非常忧心,一直在苦思解决之道。1940年7月6日,黄炎培召集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伯钧等人餐叙,“商谈大局,皆极慨叹”;当晚,黄炎培“夜半醒不能寐,念国事前途,愁虑万状”;7月15日,黄炎培晤李璜、左舜生,感到“时局更严重了”^{[8]第六卷,307—310}。随后在民盟筹组过程中,黄炎培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从黄炎培被推举为民盟首任主席就可以充分证明。

但是,黄炎培对参加民盟又是颇有疑虑的,有意和民盟保持距离,并且在《国讯》上发文表示他与民盟并无关系。1941年3月18日,盟员聚会,黄炎培提出纲领十二条要分别先后发表,“各有力条文”“宜暂付保留”;职教社的江恒源解释说,如果这些条文发表,“不啻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一面,许多事业必发生障碍”,而“我们不能使学生失学,工人失业”;最后,众人达成共识:非至适当时机不发表^⑧。这充分说明黄炎培、江恒源等人担心国民党报复或打压职教社。7月,黄炎培和张君勱等人商定民盟公开时为其守秘密,否认其参加民盟。8月19日,黄炎培又在香港对梁漱溟表示:“环境实不容其出名参加同盟,而留他在外,于同盟于大局,未始无用。”最终两人决定宣言及纲领发表时,黄炎培不列名。22日,黄炎培向曾琦、梁漱溟承诺在民盟揭晓后,亲自写一文在《国讯》上发表,以示赞助。事实上,黄炎培此次赴港的主要目的,是筹备“职教社之香港分社并自建其言论机关”,即《国讯》香港版。梁漱溟等人正在筹办民盟机关报,而主席黄炎培却要另办一份报刊,可见黄已有意和民盟保持距离。黄炎培于10月20日在《国讯》香港版发表《我之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以示对民盟的赞助。他表示:“诸友好之有政治结合者,为民盟之组织,发表宣言于报纸,我虽未藉隶任何政团,在此何可无一言!”^[20]细察其言,黄炎培明明是在民盟之外,以朋友身份说的。难怪左舜生的印象是:“黄炎培最初是很热心的,……但不久他听了某闻人的一番劝告,乃在他们的机关杂志《国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与这个团体并无关系!”^{[21]529}

梁漱溟对黄炎培的言行颇有意见,在三十年之后仍耿耿于怀地说:“最可恨者,更在民盟内部成员之间。首先黄炎培老猾无耻,贪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职位,与蒋孔权势为缘,不敢露面抗争,临阵脱逃,使民盟主任委员陷于空荡无人之境,使我受窘”,说黄炎培这是“怵于一己利害得失而变节”^{[15]第六册,362-363}。反过来,黄炎培对梁漱溟也有意见。1941年10月21日,黄炎培告诉陶行知:“梁漱溟主观深”,“漱溟每日自作文三篇,反对者以为出风头”,“大概月底要黑暗了”;陶行知的感受则是:“呜呼书生!”^{[22]550}由此可见,黄炎培不仅对梁漱溟不满,而且一度对民盟的前景也不看好。

事实上,黄炎培和国民党方面保持了密切联络。他早就于9月16日致信王世杰,说明自己对《光明报》的态度,并表示要出席参政会。9月27日,他收到蒋介石促其早归的电报。10月8日,他托人转告蒋介石和孔祥熙自己的归期。10月20日,他返回重庆,先后与王世杰、张群、陈布雷等谈过民盟事,也获得了蒋介石的召见,同时又与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周恩来、张君勱等人进行了长谈。也就是说,他力图与各方都保持密切关系。11月16日,民盟向各党各派公开的时候,黄炎培是以民盟的朋友身份出席的。但罗隆基回忆说:黄炎培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真是煞费苦心。他编造了一个上海两个卖油条人的故事”,意在说明“他们是盟员”、“我亦然”^{[16]209[22]558}。稍后,在参政会上,黄炎培在张君勱等人的提案上签名,以示支持。很可能就是在这期间,黄炎培与职教社重新加入了民盟。因为在12月1日民盟重新选举主席与常委时,黄炎培、冷遹参加了,黄炎培虽然没有被选为常委,但冷遹被选为了执行委员。到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予以解散时,黄炎培在《国讯》“说亮话”专栏刊文说,民盟于1941年公开的时候,他“便中止了关系”;到1944年民盟改组的时候,他才“重复参加了”^[23]。虽然黄炎培说的不是实话,但由此可以反证,他在1941年10月民盟公开前后采取的是模糊策略,试图两边都不得罪。

三 中共与民盟

1939年以后,中共越来越重视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这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指出,中间势力“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

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这一中间力量,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组织工作的第二个对象”^{[13]41}。而这一时间点恰好是在统建会刚刚成立后。1940年3月,毛泽东又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而“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24]705-706}。

不过,皖南事变发生后,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对中共是有意见的,中共也曾一度对中间势力有所疑虑。1941年1月25日,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中间派的议论决不可尽信。”^{[13]56}事实上,此时中间势力和中共之间确实有不小的距离。2月24日,左舜生、罗隆基、梁漱溟三人代表中间势力起草了四条意见,作为向国共双方说话的根据,其主要内容为:“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指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引者注)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次日,周恩来向梁漱溟表示:“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他们出席,亦即不成问题。”“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他们愿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15]第六册,162-163}2月27日,黄炎培、张君勱、沈钧儒、左舜生等人进见蒋介石,“谈组织特别委员会事甚洽”,随即“招周恩来共谈”,且“与恩来、必武谈至夜半始返”;28日,黄炎培等人再次进见蒋介石,“委员长对特别委员会完全同意,嘱起草规程并拟议人选,容纳各党各派,内包中共,惟对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如决定不出席,惟有根本决裂”,随后黄炎培等人告诉周恩来“此是分水岭关头,促其最后注意”,周恩来则表示须等延安电示后再予答复,当晚黄炎培等人“守至夜半无消息”;3月1日,国民参政会开会,而周恩来仍没有收到延安的电示,黄炎培等人复请参政会延期一天,并对周等“作最后之劝告”^{[8]第七卷,71-72}。3月2日一早,周恩来等人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仍不能为蒋接受。梁漱溟说:新十二条较此前提出的十二条降低甚多,但“我们并非作和事佬,调停的人。何

况这种分家的办法,和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觉失望,不能赞一词。国民党方面的情绪如何,更不必说了”^{[15]第六册,165}。黄炎培也认为:“此是中共政策改变之故,否则,条件亦已优厚,在往时求之不得了”,于是他们表示“结束不再谈”^{[8]第七卷,72}。中共参政员始终未参加这次参政会。从上述协商过程可以看出,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对中共是有意见的,而中共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中共其实很清楚中间势力整体来说是偏向国民党的。1941年3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目前政治斗争空前尖锐,许多小党派已经转到蒋介石方面,在参政会内可能造成不利于我之空气,但这是一时的,过一会即将起变化,故小党派的话不可听信,他们的话是使我们上当的。”^{[25]229}3月12日,毛泽东的判断有所改变,他说:“小党派中国社党与青年党已暂时变成蒋介石工具,但真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黄炎培、张表方等派依然是中间派。”^{[25]232-233}3月1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他们正极力赞助民盟的成立,“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14]509}。这说明中共其实很清楚中间势力整体来说是偏向国民党的,之所以支持他们联合,就是想把他们往中间拉。

3月22日,中共发布政治情报,指出:“中间阶层在这次斗争中的立场,是动摇不定的,但依然处在中间地位。(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以后,他们是站在中间立场,劝我们让步,主观上对我们好,实际帮助了蒋。……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以后,他们完全同情我们,表现了从来没有的好。但在参政会开会期间,曾对蒋允许他们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各党派公开活动问题发生幻想,又恢复到劝我让步的立场。这些中间派,可以大别为三类: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黄炎培、张澜等,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急关头,便成和事佬;一是失意政客,如张君勱、左舜生等,希望从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得了参政会主席团时,面孔就变了。但因他们都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勱、梁漱溟等正在发起组织‘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所以仍是一种中间地位。”^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共认为黄炎培、张澜等人虽然是中间派,但“在紧急关头,便成和事佬”,说明此时中共对他们并不太满意;反过来,梁

漱溟却认为他们并非做和事佬,这又说明双方对时局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二是中共认识到中间势力这种联合是为了“自保和发展”,而中共对这种联合是持欢迎和赞助态度的。梁漱溟就说他当年去香港之前,专门拜访过周恩来,周恩来让他与中共驻港代表廖承志联系,中共还赞助了《光明报》4000港元^{[15]第七册,573-575}。

民盟公开之后,中共于10月2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赞扬民盟的成立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26]12}。稍后在出席参政会问题上,中共与民盟“尚能一致”,因此,“这时中间党派可说是完全被我争取过来依靠我们这方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顽固派幸灾乐祸,以为香港失陷,民主同盟的老巢倾覆了,于是加紧对他们的压迫;昆明学潮发生,更把这种罪名不客气的加在他们身上。将张君勱扣留重庆,且要将罗隆基调渝,不许《民主半月刊》出版等。民主运动至此遭受了极大阻碍,他们这些人更感到有必要和我党亲密合作以对抗当局日益加紧的压迫”^{[13]77-78}。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救国会和中共在某些问题上是有分歧的。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救国会的反应就与中共有异。4月19日,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10]第三册,60}。中共也说:“四月间苏日中立条约订立,顽固派大作其反苏反共宣传,说中共非中国人。此时各党派态度都很好,并无反苏言论,并曾与我方交换意见,但也有部分进步分子上了当,如救国会曾对苏联表示怀疑。这是由于当局收买了一些人,有的进步分子可能落在中间分子之后,也属逆料之中。”^{[13]77}在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第二次大会前夕,救国会都曾劝中共出席,与中共的立场也不尽一致。

但是,在中共自己眼中以及其他中间势力的眼中,救国会都是最接近中共的。正因为如此,梁漱溟等人担心救国会加入民盟,“有损第三方面的独立性”,所以最初并未邀请其加入^⑩。这说明民盟有意和中共保持距离,凸显其中间立场。虽然如此,救国会却对民盟持援助与合作的态度。民盟在香港公开后,救国会曾由邹韬奋、金仲华、张友渔三人发表宣

言响应,并在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上发表多篇文章呼应民盟的主张,这对受到国民党极力攻击的民盟来说肯定是雪中送炭,所以“梁、曾等甚感奋”^{[27]683}。1942年春,救国会正式加入民盟,这也象征着民盟逐渐倾向中共。

四 国民党与民盟

1939年11月成立的统建会开宗明义地宣示:“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吾人以最纯洁的心情,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法律化”,“吾人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成立宪政政府”,“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分别公开存在”,“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也就是说,中间势力此时衷心拥护国民党的领导,而且要力促其领导地位法律化,获得宪法的认可,在此前提下,要求国民党尽快实施宪政,承认各党派地位,实行军队国家化;以中间势力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偏向国民党的;但国民党并不领情,认为该会用意叵测,“不可予以承认”^[28]。

民盟成立后,一度还是“左袒”国民党的。1941年4月5日,黄炎培向左舜生提出民盟“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的劝告”^{[8]第七卷,85}。但国民党对民盟却充满了怀疑,并力图限制它的发展。当蒋介石于3月21日得知民盟成立后,就在餐席上当众责问张群;张群乃立即询问张君勱,张君勱否认之;后黄炎培等人解释说,“所谓组织,即是前之统一建国同志会”,国民党才未继续追问^{[15]第六册,354-355}。8月21日,蒋特意召见左舜生,左便把民盟成立的经过,“原原本本坦率的告诉了他。他颇注意‘民盟’的几个重要分子”,依次问了曾琦、张君勱、梁漱溟、黄炎培等人的情况^{[29]1221-1222}。同一天,蒋在日记中说:“余对所谓各政党反动分子之言”,都用以紫乱朱之意严加痛斥。次日,他又说:“政客为恶,似是而非,行伪而僻,其可鄙甚于共党与汉奸也。曾琦、张君勱、梁漱溟之流尤甚也。”9月13日,他又说:“政客黄炎培,年逾六旬,而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天下最可恶者莫如政客,而中国之政客无德无行,尤为天下最恶之政客,非扫除而廓清之,终不能建国也。”^⑩可见,蒋对曾琦、张君勱、梁漱溟、黄炎培等人已非常反感,怒不可遏。

与此同时,国民党极力阻止曾琦、梁漱溟在香港活动,劝他们回重庆,但都遭到拒绝。蒋又专门派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飞赴香港,“密求港政府勿许《光明报》出版”,但因港英政府事先已允许了,便未反悔^{[15]第六册,361-362}。

同时,国民党对新成立的民盟则是恶言相向、肆意打击。10月14日和11月3日,孙科先后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称:民盟意在“变易政府,推倒现在的政权”,不管其主观动机为何,但其客观效果是“与敌伪之宣传,沆瀣一气,诋毁政府,背叛中央”,有类第五纵队^{[15]第六册,285[30]}。10月16日,被邹韬奋称之为官报的香港《国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民盟主张“结束党治”,这是“站在敌人的地位”,“为了敌人的便利”^{[31]566-567}。《时事解剖》杂志甚至刊文说:中共是民盟背后的发纵指示之人,“结束党治”的口号是民盟代中共唱的^[32]。可见,国民党对民盟是恶言攻击。11月中下旬,民盟参政员又在参政会上提出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的议案,双方再次产生激烈冲突,蒋介石随即软禁张君勱,打压国社党,拉拢青年党,试图分化民盟。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对蒋介石颇有意见的地方实力派也积极参与了民盟的成立。梁漱溟在1941年5月去香港之前曾在桂林待了一个多月,其香港之行得到了李济深及其子李沛文的大力支持,之后桂系代表甘介侯就加入了民盟。“对政府反感甚大,态度亦甚左倾”的东北同乡会也加入了民盟。刘文辉和龙云也赞助了《光明报》一笔钱。张澜之所以被选为民盟第二任主席,原因之一就是“与四川军人有特殊关系”,而“四川军人在当时大后方有举足轻重之势,而使国民党党权派不敢对初成立的民盟公开加以破坏”^{[12]572}。可见,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已越来越不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而这些政治异见者则逐渐联合起来,互相借重,互相声援。

五 结论

抗战中前期,青年党、国社党与国民党、共产党都是既斗争又合作,时而斗争时而合作,其主要政治目的就是推动国民党施行宪政,自己党派参加政府、获得实权,青年党甚至准备在抗战失败的情况下“出而主政”,达到“不流血革命”的目的。青年党、国社党一度对中间势力的联合都非常积极,希望借此增加自己的份量,但在民盟成立后,两党却互争雄长,不能倾力合作,严重影响了民盟的实力。蒋介石想

分化民盟的时候,就是从分化这两党入手,一边拉拢青年党,一边打压国社党。

梁漱溟一度着意于调解国共问题,结果却两边都不讨好,于是积极致力于中间势力之联合,在统建会和民盟的成立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认识 and 观点与其他党派都不尽一致,且和黄炎培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所以早期民盟的发展离他的期望还有不小的距离。黄炎培虽然对中间势力的联合也非常热心,非常积极,但他总试图几方都不得罪,和统建会、民盟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国共两方也保持比较密切的接触。不过,他这样做并不能取得他所期望的效果,结果他不仅和梁漱溟产生了冲突,还被蒋介石痛骂了。

第三党在国民党的压迫下,积极联合其他中间势力筹组联盟,但或许因为其“日渐左倾”,才被青年党一度抛弃,不过它后来还是被邀请加入了民盟。救国会被视为“中共外围”,因此最初没有被邀请加入民盟,但在民盟逐渐疏离国民党而亲近中共之后,救国会就正式加入了民盟。

由于中间势力成分复杂,互相之间又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存在,所以并不能同心协力,这一方面影响了民盟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容易被国共两党分而治之。中共即把中间势力区分为三类,予以不同对待。在皖南事变后一段时间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黄炎培、张澜,“失意政客”张君勱、左舜生以及梁漱溟等,都一度倾向于国民党,所以中共认为中间派的话“不可听信”,或“决不可尽信”,不然要上当;后来中共之所以支持和帮助民盟,就是希望中间势力“不要偏向国民党”,持“真正中间”的立场。

国民党对统建会的态度属于冷处理,对民盟则是怒火中烧,“加紧对他们诬蔑,辱骂,压迫”^{[13]77-78},孙科对民盟的反应就“真同疯狂”^{[27]683},蒋介石也认为张君勱等人在参政会上的提案是对国民党的“最大侮辱”^⑩。不过,王世杰在1941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说:“张君勱、曾琦、梁漱溟等,组织‘民主政团大同盟’,在港办一《光明报》,发表其主张。彼等所号召者为民主主义;……国民党为忠实履行其党纲起见,确应有推进民治之决心与勇气。对于党外呼声,不可以人废言耳。”^{[10]第三册,169-170}可惜蒋介石没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

总而言之,国民党对中间势力一再呼吁实行宪政的呼声充耳不闻,不予正面回应,对他们的联合也不信任、不支持,反而尽力阻止和打压,于是乎将中间势力逐渐推而远之;中共则由怀疑到鼓励、支持与帮助,逐渐拉而近之。整体来说,“占大多数”的中间势力是由最初偏向国民党、后来才逐渐倾向中共的,这无疑是抗战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变化,对后来中国政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 ①目前学术界关于民盟的学术研究不多,其中涉及到民盟早期历史的论著主要有: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简史(1941—1949)》,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戚如高《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曹健民等编写《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许增炫《抗战时期的民盟与中共的统战政策》,《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6期;李仲明《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吁——试论抗战时期的梁漱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王凤青《抗战前期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调解国共争端的努力》,《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2期;杜俊华《试论抗战时期民盟成立初期的内部纷争》,《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5期。
- ②千家驹认为“三派”是指“乡村建设派”、“中华职业教育学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这和一般的说法颇不一致。详见:千家驹著《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28页。
- ③《青年党举行党派问题座谈会内容(1940年1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特9,26.6号。
- ④参见:梁漱溟《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附记在香港一段斗争生活之大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按:本文所引梁漱溟材料中括号内的内容,除特别注明者外,都是原文中有的;材料中的“吾人”指称梁漱溟及其同人。
- ⑤《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1-2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
- ⑥关于此事之详细讨论,参见:杨天石《“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收入:杨天石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272页。
- ⑦统建会成立当天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了,还有待更多的资料予以考证。目前通行的说法是:有国社党罗隆基、罗文干、胡石

青,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第三党章伯钧、丘哲,职教社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建派梁漱溟,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以及无党派所属的张澜、光升。但是,黄炎培日记说明冷遹、江恒源两人当时并没有参加,而是需要黄炎培去动员加入(参见:黄炎培著《黄炎培日记》第6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第208页)。陶行知日记则记载:12月7日,章乃器示其“统一建国同志会”公约,“我说待考虑”(参见: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日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这些材料说明有些成员是后来被动员加入的,不一定参加了成立会。

⑧本段及下两段,参见:梁漱溟《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附记在香港一段斗争生活之大略)》,《梁漱溟全集》第6册,第355-358页。按:梁漱溟说这一天“似为3月17日”,但据《黄炎培日记》应为3月18日,因为这一天黄炎培在日记中说,在聚会时,他提议“非准备完成不公表,但先发表同人时对局主张,皆同意”。

⑨参见:《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194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党内秘密文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8-1160页。按:本段的着重号是笔者所加。

⑩李璜著《学钝室回忆录》(增订本)下卷,第572页。梁漱溟的说法是:因为救国会那时有“中共外围”之称,而民盟的产生却不愿被人看作是出于中共所策动。参见: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梁漱溟全集》第6册,第964页。

⑪参见《蒋介石日记》1941年8月21日、22日,9月13日。

⑫参见《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2日。

参考文献:

- [1]“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2]中央联络处.中国民主同盟概况[G]//中共活动真相:第四册//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
- [3]张君勱.吾人处抗战时期中之态度[J].东方杂志,1940,37(13):59-62.
- [4]社论.团结的增进[N].大公报,1938-04-02(2).
- [5]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民主社会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6]陈绍禹.旧阴谋的新花样——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的演讲[J].解放,1939,(62):5-11.
- [7]张君勱.答陈绍禹——延安演词中之附带质问[J].时代文选,1939,1(2):14.
- [8]黄炎培.黄炎培日记[M].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青年党[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10]王世杰日记[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11]曾琦.五年来朝野协力之回顾[M]//陈正茂,黄欣周,梅渐浓.曾琦先生文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12]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增订本):下卷[M].香港:明报月刊社,1992.
- [13]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 [15]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16]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M]//谢泳.罗隆基: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 [17]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 [18]中央宣传部关于向全国教育界各小党派小团体推广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9]张曙时给中央统战部的报告——川康特委统战工作[G]//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内部资料).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1989.
- [20]黄炎培.我之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J].国讯(香港),1941,(2):25.
- [21]左舜生.三十年见闻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 [22]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日记[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 [23]黄炎培.我与民盟[J].国讯,1947,(439):封面.
- [24]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 [25]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26]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G]//中国民主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 [27]邹韬奋致沈钧儒函[G]//周天度,孙彩霞. 救国会史料集.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28]闻黎明. 国民党眼中的统一建国同志会[J]. 百年潮,2004,(10):74-77.
- [29]左舜生. 青年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史料[M]//陈正茂. 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中).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 [30]孙院长训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J]. 时事解剖(香港),1941,(11):9.
- [31]邹韬奋. 汪逆可做护符么? [M]//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 韬奋全集:第10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32]张弓. 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及其《十大纲领》[J]. 时事解剖(香港),1941,(11):6-9.

On the Division and Reunion of the Middle Forces and the Responding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ANG Tian-hua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division and reunion of the middle forces as well as its respe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KMT and the CPC were not as simple as showed in the existed researches but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ooperation, divergence and even struggle coexisted between the middle forces and the KMT, and between the middle forces and the CPC. As the war went to the middle stage, the middle forces resorted to uniting together to coordin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as well as to increase their importance. A loosely administrated organization——the Reunification Companion firstly came into being and then came a better united organization——the China Democratic Political League. However, two members of the founding committee——the Third Par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aving Nation had once been somewhat alienated to the new organization. The Kuomintang offered zero trust and support to the middle forces' reunion, but prevented and suppressed it with utmost ability, which resulted to gradual alienation to the middle forces. The attitude of the CPC was from suspicion to encouragement, support and help, gradually pulling the middle forces close. Despit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choices among the middle forces, they gradually inclined to the Communist Party, which was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middle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had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later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the middle forces; China Democratic Political League; the Kuominta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责任编辑:凌兴珍]